



#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成臻铭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关键词:**土司学;土司制度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章编号:**1007-4074(2017)04-0019-12

**作者简介:**成臻铭,男,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引用本文:**成臻铭.“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4):19-30.

目前,随着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学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持续召开以及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土司学”概念似乎已成耳熟能详的专用名词。对于其建构的历史与现状,廖佳玲、谭清宣已写过文章进行研究。该文在概述中国土司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其理论与方法建构的具体内容和存在的实际问题,是一篇用功甚深的佳作<sup>[1]</sup>。有鉴于以往的研究,笔者拟从“土司学”的提出、“土司学”推进的方式和“土司学”推进的着力点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期望能够对进一步建构“土司学”提供助力。

## 一、“土司学”的提出

“土司学”一词的出现,并不在当今。它与当今提出的“土司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 (一)“土司学”名称的出现

从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所见,最早使用“土司

学”一词的是周予同在民国时期所著的《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一书。该词的内涵,是指土司辖区所设的地方官学“儒学”,属于与商学、卫学等性质相近、有名无实、仅作晋身之阶的特殊学校<sup>[2]</sup>。其称呼在乌江流域,似乎与明朝洪武年间设置的播州长官司学、贵州宣慰司学、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司学和永乐年间设置的思南宣慰司儒学、酉阳宣慰司学、乌撒军民府学等,并无二致<sup>[3]</sup>。应该说,这是后人对在土司辖区设立的地方官学“儒学”的概括,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溯源的话,它应来自明代文献中的“土官学”。

(洪武二十八年,1395)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明史)卷3《太祖本纪三》》

(成化)四年(1468)令:凡京学,二年贡三人。军民指挥使司卫学,照府学例,军民生相间,一年贡一人。都司及土官学,照州学例,三年贡二人。《(大明会典)卷77《贡举·岁贡》》

云:……弘治十年(1497),巡抚都御史沈军令

世英入粟嗣父职,将以平之,而仕垓奏许不止,曰寻干戈已解复结。是时,敕调世英贵州随征,而兵部移文有“两江口长官司”字。仕垓疑世英得设官署,将不听约束,复奏言之。于是巡抚都御史阎仲宇、巡按御史王约等令前后奏词及各官勘报,议处以闻。下兵部、都察院议,请令世英,令所据小江七寨于仕垓,止领大江七寨,听仕垓约束。其原居两江口系各夷喉襟,请调清水溪堡官军来守,而徙世英于沱埠,以绝争端。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用革冥顽。……奏上,悉从之。(《明孝宗实录》卷200“弘治十六年(1504)六月乙巳”条)

弘治十三年(1500)奏准:自十四年为始,各处州学,俱四年三贡。其云南、四川、贵州等处,除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军民相间,一年一贡。其余土官及都司学,各照先年奏准事例,三年二贡。(《大明会典》卷77《贡举·岁贡》)

(嘉靖元年,1522),“赐播州宣慰司儒学《四书集注》一部,从宣慰使杨相奏也。”(《明世宗实录》卷13“嘉靖元年四月乙未”条)

从明清两代所反映的上述五则材料看,“土官学”显然专指土官(土司)辖区设立的地方官学。这类儒学不仅在明初洪武年间已经设立,而且明朝中央政府对之也很重视。正因为此,才有每三年一次或两次地选拔土官学的人才进入京师国子监就读,使得土官学广泛设置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处”,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以及给个别土官学赏赐图书之事的发生。

由于明中期(1436—1521年)以后出现“土司”一词,土官、土司往往混用,而土官衙门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称“司”者很多,因而人们习惯将土官辖地所设之儒学称为“诸土司儒学”。如此一来,后人将之简称为“土司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这时的概念与土

官学概念一样,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都是指土官(土司)辖区的官办学校“儒学”。这里的“学”,仅指学校这一实体,其名称的来由是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用夏变夷”之法的一种结果,其中内涵有古人的创造和后来民族教育史学者的努力。这种学校,它们既与一般地方行政区所设的府学、州学、县学和军事系统所设的都司学、卫学等所学有别,又与以儒学为讲授内容的社学、书院、私塾等官私教育机构不同,有宣慰司学、土府学、土县学等等级上的区分<sup>①</sup>。而今天所要构建的“土司学”之“学”,则与宋代的“科举之学”和清代戏称《红楼梦》的“红学”的内涵一样,是指学问或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或者说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 (二)“土司学”内涵的拓展

21世纪初,“土司学”被赋予了新内涵。2009年4月,“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城县召开。笔者被特邀与会,提交了《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一文。该文讨论了土司的含义与类型,从土司学历史发展、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土司学的研究主题与主要内容、土司学研究的核心层面、土司学的现代意识等方面讨论了土司学的规定,进而探讨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认为:土司学是一门“研究土司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主要以“土司”或“土司活动”、土司区、土司政府、土司关系、土司文化(含土司政治文化)、土司现象或土司形态为研究对象,分土司学、土司志两个支系,重点研究土司文化<sup>[4]</sup>。从指向上看,此“土司学”与明清时期的土官学或土司学比较,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被转化为一个纯粹的专门学学科概念,使明清时期的土司学校教育成为其众多研究对象之一。

由于“土司学”被赋予了学科内涵,因而自此以后的八年之中,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反响强烈。

<sup>①</sup> 参见杨明:《清代白族地区的教育开发》,《民族论坛》1992年第1期;张羽琼:《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王秀山:《清代湖南地方官学藏书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张羽琼:《论明政府在贵州的兴教举措》,《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王学义、薛晓燕:《现代教育的远近溯源——论封建性教育与开放性教育的矛盾》,《教育探索》2004年第6期;覃晓航:《壮族古代汉文教育的源流》,《民族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喻本伐:《学田制:中国古代办学经费的恒定渠道》,《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4期;宗韵、吴宣德:《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颜建华:《明代屯田下的黔中社会》,《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许莹莹:《论明代客家教育的勃兴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汀州府的儒学为考察重点》,《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当然,这种反响以土司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为时间节点(2012年秋至2013年春夏)<sup>[5]363-364</sup>,出现较大差异。

在申遗研究时间节点以前(2009—2013年),仅《来宾日报》、李世愉、毛佩琦、郭开朗、岳小国、李大龙、邹育等先后有所反应,肯定“土司学”提出的价值与意义。

湖南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论土司与土司学》中,提出了“土司学”这一概念,使得土司文化的研究路径更加广泛和科学。<sup>[6]</sup>

成臻铭先生的《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一文,是一篇比较系统阐述“土司学”概念、研究对象的文章,颇具代表性。……构建“土司学”……一是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二是现实研究的需要。……是为了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和理论化。……是为了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探讨土司制度发展规律,并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借鉴。<sup>[7]</sup>

它不同于历史学,不同于民族学,不同于文化人类学,它是一个综合许多学科的独特学问,可以自成体系,完全有独立存在的理由。<sup>[8]</sup>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召开永顺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在会上,时任湖南省副省长郭开朗就……土司学或是土家文化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sup>[9]</sup>

学界关于土司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学者提出构建“土司学”之设想。<sup>[10]</sup>

构建土司学的呼声,显示着土司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并成为了研究热点。<sup>[11]</sup>

今天对土司学的研究,它是进一步了解、认识、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对多学科理论交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sup>[12]</sup>

从上述七则材料来看,“土司学”的提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更是一种学术向前发展的标志。正因为此,建设“土司学”学科并将其引入到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域,极为必要。

申遗研究时间节点以后(2014—2016年),由于土司遗产逐步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因而,

学界彭武麟、李良品、李大龙、万红、段红云、彭福荣、岳小国等人,以及新闻媒体对“土司学”的提出与构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反响强烈。

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土司学还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一方面是由于土司制度本身具有多方面、多重时空架构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民族发展、族际关系等丰富内容,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人文学科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及其人文关怀和现实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土司制度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土司学。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无论从研究对象与内容还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看,土司学研究的开展都是相当充分而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sup>[13]</sup>

2009年4月,吉首大学成臻铭教授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举办的“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土司学”及其理论构建。后来,成臻铭教授在《青海民族研究》上发表《论土司与土司学》一中,就土司学的历史发展、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土司学的研究的主题与主要内容、土司学的核心层面、土司学的现代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提出建立土司学的构想,对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土司学”构建业已成为土司研究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sup>[14]</sup>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土司学”的设想。这种情况即体现出边疆研究已经向深度和广度拓展。<sup>[15]</sup>

目前,土司学研究渐成显学,特别是随着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开展,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得到彰显。土司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子之一,也不断地引起国人的关注和讨论。<sup>[16]</sup>

2010年成臻铭教授……第一次提出了“土司学”这个专学名词,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土司学”是一门专门学,以及构建“土司学”的意义等已成为学界的共识。<sup>[17]</sup>

近年来,学术界对土司制度研究已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视角和领域,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将土司制度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多视角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提出了构建“土司学”的观点和想法。<sup>[18]</sup>

近年来,随着土司学的构建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的不断深入,容美土司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领域。<sup>[19]</sup>

目前,土司制度作为土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主要内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土司文化”不断升温,土司学也随之呈现出“热学”、“显学”之势……由此看来,一门新兴的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专门学术研究领域——土司学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任重道远。<sup>[20]</sup>

土司文化……其本质是具有复杂结构的伦理型政治文化,在“土司学”等学术理论研究、民族地区发展、中华民族团结、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具有多重价值。<sup>[21]</sup>

近年来,土司问题研究日呈欣欣向荣之势,已有学者提出构建“土司学”的设想。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希望本文的个案研究能为土司研究日益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注脚。<sup>[22]</sup>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得到快速度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自2009年成臻铭教授提出“土司学”概念以来,中国土司学研究不仅为湖南、湖北、贵州三省三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大大推动了中国土司学的建构与发展……中国土司学这一专学概念是我国百余年来土司研究的硕果,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2009年成臻铭教授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举办的“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从而开启了我国“土司学”从无到有的学术发展史历程。……成臻铭先生的“土司学”专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大批土司研究专家学者的认可、丰富和完善。在这些专家学者眼中,“中国土司学”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是我国百余年来土司研究的硕果。换句话说,自中国土司学学科概念提出之日起,我国的土司问题研究已正式过渡到中国土司学学科体系之中。……中国土司学,是中国土司研究的学科化。<sup>[1]</sup>

在我国当下,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与“土司学”研究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申遗

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方、文本编制方以及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以形成符合申遗与“土司学”要求的背景知识。……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角检视时下我国方兴未艾的“土司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申遗文本从工作层面厘清了“土司遗产”等相关概念及其价值,而从学术层面上讲,其内容或理论支撑主要源于学界正在着力构建的“土司学”。……2009年4月,吉首大学成臻铭教授在广西忻城县举办的“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土司学”及其理论建构。以此为标志,我国土司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人们在进行宏观与细部事象研究的同时,更为重视土司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土司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学”,在于它既是一门独特的专门学问,又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广阔研究领域。<sup>[23]</sup>

从上述12则材料中可见,“土司学”的提出标志我国土司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不仅是土司研究走向欣欣向荣的标志,同时也是土司制度研究取得成就、边疆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标志;作为专门学科的“土司学”,不仅对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领域以及学术理论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为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土司学”所彰显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决定了进一步构建它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土司学”虽在明清时期名称有异,但均以土司“官学”的面目出现。这一土司教育实体在民国时期已被学者觉察,后来一直在民族教育史领域沿用。该概念自从被阐发为与土司相关的学科概念后,立即得到学界和政界的肯定,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 二、推进“土司学”的方式

“土司学”提出后,之所以能够在政界与学界引起重视,使之呈现明显的正走向国际化的“热学”、“显学”趋势,是因为八年来的加速推动。这种推动,主要来自五方面:

### (一)发表专文探讨“土司学”

发表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学”,区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忘“初心”进行专门探讨。从截止



到2016年8月以“土司学”题名的16篇文章来看,笔者占6篇,它们先后是《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时势造学:土司残留时期的中国土司——1908—195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1960—199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演进轨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再论土司学的对象与研究方法》(《民族论坛》2012年第8期)、《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民族学刊》2014年第1期)、《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这组论文主要探讨了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土司研究分期和土司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土司学的学科建构方案。学科建构方面,它定位土司学为专门学科,指出其学科特点是具有“三性”,在“时/空/群/事”视野下对土司学实行“两级分类”,不仅确认土司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为区域总体史方法,而且初步认定土司学是以历史学、政治学为依托的交叉学科。其不足的是,对土司学的基本功能、基础理论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尚未展开探讨。

第二种是积极主动参与探讨。在16篇文章中,类似论文占了10篇。它们是:贺小燕《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研讨会召开:土司称“学”任重道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1日)、杨天波《土司学:类似红学的专门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1日第149期4版)、李世愉《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凯《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回顾与思考》(《民族论坛》2012年第8期)、邹育《分析土司结构与改革和土司学的研究意义》(《大众文艺》2013年第17期)、李良品、李思睿《构建“土司学”的几点思考》(《青海民族研究》

2014年第2期)、李良品《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彭武麟《土司制度与传统中国多民族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现代性问题——兼谈土司学研究之路径与理论取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廖佳玲、谭清宣《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岳小国《申遗视阈下的“土司学”研究》(《三峡论坛》2016年第4期)。这些论文,根据各自的治学经验提出了专门学科建构的方案,进而提出土司学的价值与意义及其学科体系,且认为建构该学科体系“任重而道远”。不足之处,是仍然受制于治学经验,对学科建构范式缺乏理论观照。除上述论文外,还有30余篇论文间接参与了“土司学”的探讨,如前所言,其研究取向是肯定“土司学”提出的价值与意义<sup>①</sup>。

第三种是媒体进行采访报道。率先针对“土司学”进行采访报道的,有广西来宾市的《来宾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报》,不仅以“土司学”为题报道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概况,而且采用四个多版面,以“独家报道”形式报道了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的调查结果及“土司学”的理论建构<sup>[9]</sup>。此外,《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中国民族报》《澳门日报》《中华遗产》《中国社会科学网》《半岛都市报》等,也针对“土司学”进行过采访报道。

## (二)国家课题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推动土司学

“土司学”提出前与提出后,土司研究的助力发生了迥然有别的变化。

首先是国家课题助力。“土司学”提出之前,仅西北民族学院王继光教授的“甘青土司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蓝武博士的“华南边陲传统民族社

① 针对“土司学”的价值与意义,有“价值说”、“意义说”和“标志说”等三种说法。“价值说”认为,“土司学”的提出是对传统研究视角和领域的一种突破,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它有利于多学科研究,使研究路径更加广泛和科学,对学术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意义说”则在肯定“土司学”的学术价值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其现实意义,认为它对今天包括区域民族自治在内的“自治”治理具有借鉴价值,对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标志说”认为土司学是研究局面良好的“一种标志”,是土司或土司制度研究取得成就、方兴未艾、欣欣向荣、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边疆研究已经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标志。

会的国家认同——以壮族土司制度为实证”分别于1987年、2008年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自从2008年《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一书出版,尤其是2009年全国土司文化研究会在广西忻城县召开、正式提出“土司学”及其理论建构之后,土司研究项目逐渐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重视。2010年,笔者获一般项目、龚荫和彭福荣获西部项目各1个。2011年,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之后随着历届土司会议的持续召开,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加大了土司研究项目的立项力度。2012年,李世愉、龚荫、周凌玉、齐德舜各获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1个;2013年,瞿州莲、葛政委、李莹各获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1个;2014年,陈季君、莫代山各获一般项目、青年项目1个;2015年,彭陟焱、田利军各获一般项目1个。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后,2016年,土司研究课题的国家立项数目超过历史时期。这一年,唐晓涛获重点项目1个,李良品、罗康智、罗维庆各获一般项目1个,蓝武、尤佳、冉红芳、谭清宣获西部项目各1个。

其次是申报世界遗产推动。“土司学”提出以后,2010年秋,《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程前往老司城遗址进行了大型采访报道。基于此,2011年8月,“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会前,土司学家、藏学家、“百岁老人”杨公素(余贻泽)先生,为大会撰写了“继承历史,开创未来,土司研究,走向世界”的预言性题词。会后的11月份,湖南省委省政府将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上政府工作日程。为此,12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老司城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确定研究专题。随之,永顺方面与吉首大学进一步合作,确定《老司城文化研究课题》写作提纲。10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申遗专家在吉首大学和永顺县的相关专家的具体说服下,宣布正式启动老司城申遗事务。之后在为期七个月时间里,原定的十部“土司文化研究丛书”在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游俊教授主持下,如期完成并最终出版。这是国内首套与“土司学”相关的丛书,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土司遗址于2015年7月4日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也证实了杨公素老人的最初预言。

如果说土司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建构得益于国家课题的话,那么,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则开辟了土司学走向世界的一条道路。由于世界遗产备受社会各方面关注,因而,与之相关的土司遗址、土司研究、土司学等也因此受到关注,土司研究未来命运进一步发生改变。

### (三)组织会议和期刊讨论土司学

组织会议讨论土司学,起始于2010年。“土司学”概念和理论建构提出以后,次年在广西桂林召开了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始有学者专门讨论“土司学”的构建问题<sup>[24]</sup>。之后从2011年至2014年的连续四年中,“土司学理论与方法”一直成为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的研究主题。在会议的引领下,更多学者开始投身于“土司学”的建构,参与相关理论研究。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土司学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几届‘中国土司制度国际研讨会议’的召开对土司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sup>[25]</sup>正因为这些会议的前期推动,因而就有了“中国土司学高层论坛(2016)”的进一步召开<sup>[26]</sup>。

采用期刊开辟专栏的形式推进“土司学”,开始于2012年。当年,笔者在《民族论坛》第8期首辟“土司学研究”专栏,随之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开辟“历史学·土司研究”专栏;2013年,笔者在《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开辟“土司学研究”专栏,并以“特色栏目”的形式开办至今;之后的2014年,笔者还在《民族学刊》第1期开辟了“土司学申遗研究”专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土司专委会”)于2014年正式成立并落户吉首大学以后,更多学者参与了“土司研究”专栏的开辟,有的还获得了土司专委会颁发的认定证书。2015年,李世愉研究员在《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李良品教授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分别开辟“土司研究”专栏和“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专栏;2016年,李世愉研究员又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开始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这些期刊专

栏每期刊发的论文少则2篇,多则7篇,它在牵动文摘期刊和众多学术网站专门转载的同时还带出了其他期刊不设主持人开辟类似专栏。

#### (四)出版丛书强化土司学

继“土司学”概念与基本分期观点提出之后,从2012年到2014年,笔者以《青海民族研究》“土司学研究”专栏为主体,连续发表一组文章,讨论中国土司学史问题。这一土司学史的研究取向得到了学界专家学者的响应与支持。

在支持过程中,表现最杰出的是长江师范学院的民族学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科研创新团队,他们在李良品教授率领下,从2014年开始着手组织编纂出版“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文库”。该“文库”尤为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目前已出版4部著作,先后为《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1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1908—2012年)》(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14年)》(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15年)》(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其编纂办法:一是发布“研究报告”或“学术史之回顾”,二是编选研究论文,三是报道学界重大事件,四是附录研究成果与课题目录、政府相关文件。这就充分反映了其“展示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专学构建”的学术宗旨。

#### (五)建立机构推进土司学

建立机构推进土司研究,开始于“土司学”概念提出以前。当时的机构,一个是2004年秋建立的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另一个是2007年春夏建立于长江师范学院的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两个机构均为地方院校建立,分别以开发与发展民族地区提供历史借鉴、增强学校直接服务地方的功能以及促进学校民族学学科后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繁荣为旨归。机构建立后,分头集中学者力量,积极推进土司研究事业。可以说,“土司学”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相关平台的推进。

“土司学”概念提出以后,两大平台的学者又积极推进土司学研究。在他们推动之下,如前所言,就有了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直至历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土司专委会”这样全国性的、能够影响全球的学术组织于2014年8月的成立。截止到2016年12月,专委会拥有海内外个人会员130人,团体会员1个。在专委会的推动下,长江师范学院官网于2015年4月挂出学术网站“中国土司网”,吉首大学官网于2015年11月挂出反映专委会工作信息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工作网站”。不仅如此,专委会还在创办土司文化研究基地、组织学术讲座、开辟学术研究专栏、编纂大型土司研究丛书、支持土司遗址与文物的整理与保护、秘书处办公规范化建设、编发“工作简讯”、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员发展、评选优秀成果及课题资助、指导地方高校制订土司学科规划建设等方面推进工作<sup>①</sup>,为“土司学”的建构与推广创造条件。

可见,“土司学”提出八年来,学界在发表文章、组织会议和期刊、出版丛书、建立机构方面,确实为“土司学”的建构与推广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使“土司学”逐渐变成学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而且使土司研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扶植对象,并使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速度,无形之中强化了中国土司研究由“绝学”走向“显学”并最终面向全球的格局的形成。

### 三、推进“土司学”的着力点

土司研究固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之一,但是其背后却是一个多世纪积淀下来的日益突显的研究焦点问题。对于这些焦点问题,李良品反思良多,他发现主要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学概念不统一,研究对象不一致,理论体系不健全,研究方法不全面”<sup>[14]</sup>,认为如果不高度重视“将会对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及‘土司学’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sup>[27]</sup>。苍铭对此也有过反思,认为“申遗文本编制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

<sup>①</sup> 参见专委会秘书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2016年9月9日)。

研究不充分的问题,也是未来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sup>[28]xii</sup>从类似信息来观察“土司学”推进的力度,局限性依然明显。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仍值得专家学者深入田野并静坐书斋,奋力突破相关学术瓶颈。至于何以突破,笔者认为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改进土司学研究,第二步是最终建成“土司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它可以在找准着力点的情况下,借重当今土司学界新人辈出的大好局面,同时推进。

### (一)重视土司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的视野拓展

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学术研究传统。“土司学”提出后,这种传统之中又融入了多学科研究的智慧。

早在2011年,马大正提出,现有的中国土司制度研究应在发掘与整理土司资料以及拓展土司研究视野和内容方面下足功夫<sup>[29]</sup>。李世愉更是指出,虽然“土司称‘学’任重而道远”,但“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将会成为一门显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构建‘土司学’,既因研究对象的重要,也是现实研究的需要”<sup>[7]</sup>。李良品总结100年的土司研究态势之后也认为,土司研究“已经逐渐形成土司志和土司文化两个研究传统以及历史与现实相关性研究的态势,进而为‘土司学’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sup>[30]</sup>。上述讨论,可以说为确认推进“土司学”的着力点,划出了一个范围。之后,叶小琴结合嘉绒土司研究需要提出,期望能有土司通论性著作、跨学科理论、比较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引导研究,并且认为“这与成臻铭先生提出的‘土司学’要求相一致的。”<sup>[31]</sup>周妮认为,“地名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可以“利用地名学拓展土司学研究的范围”<sup>[32]</sup>。

由于土司问题研究涉及边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庞大内容,又有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和用语,因而,商传、李世愉、李良品、罗维庆等提出,应把厘清“土司文化”、“土司”、“土司制度”、“土司学”等基本概念视为土司学必须认真实施的基础工程,进一步编纂《土司制度通史》《土司大辞典》

《土司印信图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地图集》等史料性、通史性和图文类工具书,妥善处理好学科理论化、史料系统化、研究扩大化等“三化”问题<sup>①</sup>。笔者认为,他们这种意见对于找到土司研究的资料、视野与内容的着力点进行专业化表达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也为一些学者的专门探讨所证实:余仙桥考察土司遗产研究史时发现,只有在土司学理论体系、学术概念基础上进行国内外土司的对比研究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土司分布流变的对比研究,才能实现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定位<sup>[33]</sup>;赵丛苍等人考察军事考古学与土司学的关系时发现,学科协同研究可以深化相关概念、方法、理论与意义的阐释<sup>[34]</sup>;马国君考察土司制度时发现,加强土司制度存在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土司制度与流官制度比较的学理分析,可以找寻构建土司学的理论依据<sup>[35]</sup>。

绝大部分学者对于构建“土司学”,表现出了应有的信心,其中不乏有关未来操作方向与途径的真知灼见。李莹认为以往的土司研究,“一直集中在土司制度的源流、发展、流变及影响,及各土司的传承、朝贡,或著名土司人物、区域土司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上”,与“土司学”作为多学科交叉整合之下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的总体要求存在差距,建议“土司学”要朝着内容多元化、多学科体系、可持续的方向发展<sup>[36]</sup>。蒲瑶分析国外土司制度研究成果之后认为,土司学的个案研究需要借鉴国外的独特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sup>[37]</sup>。周扬、雷学华认为“土司学”的定义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借助国外学者的视野与观点,采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史料,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土司制度<sup>[38]</sup>。彭武麟认为以往的土司研究“多是就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土司制度具体内容而展开”,容易引起争论,因而他主张土司学要在传统中国多民族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现代性的视野中具体考察土司制度<sup>[20]</sup>。岳小国从申遗与土司遗产保护工作的适应性对接出发论及了土司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拓展问题,认为“成臻铭教授提出的

① 参见商传:《土官与夷官之别看明代土司的界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李良品、李思睿:《构建“土司学”的几点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罗中、罗维庆:《共识缺失:土司研究泛化的成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李世愉:《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李世愉:《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等文的讨论。



今后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很有见地”，土司学研究面向世界已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土司学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形成一个更为开放、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在翻译介绍国内外优秀成果、加强国内外同行互动交流、规范学术参照体系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探索出土司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模式<sup>[23]</sup>。

由上可见，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固然仍存在着研究不充分问题，但上述学者的见解，对于找到土司研究资料、视野与内容的着力点，采用多学科理论方法，以土司为研究切入口，服务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需要，最终澄清聚居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地带的人群所带来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确实有所帮助。

## （二）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土司现象是发源于中国并弥散于东南亚的特殊政治文化现象。由于对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缺乏系统构建，因而，这一现象远远没有澄清。正因为此，寻找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着力点，有效避免土司研究的扩大化和碎片化问题，变得极为必要。

早在2010年，李世愉就“土司学”推进力度指出土司称“学”任重道远<sup>[24]</sup>。随后，毛佩琦指出土司学学科建设，“它需要规划统筹”<sup>[8]</sup>。最近，李良品提出了一个“中国土司学”的工作方案，他认为“‘中国土司学’作为一门专学，必须在凝练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建设学科队伍、加强学科研究、搭建科研平台等方面着力。只有土司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强‘中国土司学’的学科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快速建立起‘中国土司学’，并使之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立于我国学科之林。……土司学这一概念提出仅五年，就像一初生的婴儿，仍需要无数研究者细心呵护。”<sup>[39]</sup>显然，专家学者对于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存在的困难有着充分估计，所提方案也具有可操作性，它无疑为“土司学”的最终建成提供了助力。

提及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中国边疆学”开拓者马大正先生所做的工作就很值得借鉴。他从1997年开始思考“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1999年提出“思考要点”，之后继续思考，最终凝集

成《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一书。顺着该书的学科观察视野，笔者以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学科定位、特点、内涵与分类、功能、性质、依托与交叉、基础理论与方法方面予以加强。初步看法是：

其一，“土司学”的学科定位。土司学是一个专门学科，它既是一门探究土司现象形成与发展规律、土司治理取向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同时又是一门考察中国与世界各区域自治历史发展的轨迹，探求各层次自治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战略性的专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

其二，“土司学”的学科特点。土司学具有综合性(广博性)、现实性(独特性)和实践性等“三性”。综合性(广博性)是指土司学的内容，涉及中华民族、东南亚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阶段，涉及土司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与规律，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需要以土司为整体，采用国内外多学科综合的视野与方法进行总体研究。现实性(独特性)是指土司学研究的范围。它固然包括土司历史文化，但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之下的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是地方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实践性，是指土司学立足于地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实践，吸取往日土司治理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观察现实、分析现实与指导现实，解决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与热点问题，以此适应社会并引导社会。正是因为土司学具备“三性”，因而实行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仿现场研究，也应该是可行的。

其三，“土司学”的学科内涵与分类。按照时间、空间、群体、事件的标准，对土司学可实行“三级分类”。其中，“土司学”的一级学科为土司学；二级学科是土司历史学，土司政治学(土司政府)，土司经济学，土司人口学，土司文化学，土司历史地理学(土司区)、土司民族问题研究(土司民族志或土司民族学)，土司社会学；三级学科，有土司历史学之下的土司考古学、土司文献学(土司史料学)、土司研究史学，土司政治学之下的土司安全学、土司法制学、土司军事学、土司管理学，土司历史地理学之下的土司政区地理学、土司经济地理学、土司军事

地理学、土司地理文献学、土司历史地图学、土司文化地理学(土司宗教地理学、土司风俗地理学)、土司聚落地理学、土司历史自然生态地理学、土司医学等。

其四,“土司学”的基本功能。土司学具有文化累积和资政育民等“两大功能”。围绕文化累积功能,它又延伸出描述功能和解释功能,即通过发掘与整理土司历史文化客观事实的过程,描述清楚“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回归到“是什么”这一客观历史文化的背后,解释清楚“为什么”的问题,以及从学科理论上进一步解释“说明什么”的问题,以此把握土司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围绕资政育民功能,它体现出具有“经世致用”性质的预测功能和教育功能。所探求的“怎么办”的问题,属于前瞻性、预测性与对策性问题。它既有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事实预测,又有针对服务未曾到位、提出前沿问题、指明研究方向的学科预测。由于这些描述、解释和预测过程会对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产生影响,因而“土司学”又具有教育功能。

其五,“土司学”的学科性质。土司学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整合的交叉学科,它试图还归原本的没有学科分野的传统土司文化知识,并使这一知识能在治国理政、教化民众中发挥作用。由于土司现象属于历史现象,因而,土司学研究自然是以历史学为依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是土司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是土司学赖以深化、发展的凭借。借助这些学科的互通、交融与集约,“土司学”不仅还原历史真实,而且预知未来。

其六,“土司学”的学科生命力。土司学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其生命原动力在研究对象与研究体系方面得以体现。从研究对象而言,土司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统一的多民族中华帝国连为一体,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从研究体系而言,土司学体系本身是一个二元性结构:其基础研究部分,具有以史为鉴的资政功能;应用研究部分,则可以为“一国两治”、民族区域自治、村民自治的合理引导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合法保护提供有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方面的决策咨询,具有现实服务功能。

这种原动力,是土司学赖以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其七,“土司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为“中华帝国”肌体里的土司,其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土司的认同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正因为此,可以视土司治理与认同理论为“土司学”的基础理论。历史地看,无论是羁縻制度、土司制度还是“改土归流”,无不涉及土司的治理与认同,以及“大一统”国家范围内的区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一统”观念之下的土司治理与认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围绕土司学的“五大主题”,土司治理与认同的主体是土司和土司政府,客体是土司区,手段是土司制度,终极目标是土司关系。土司关系不仅是考量土司制度合理性的标尺,而且也是观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窗口。以基础理论为工具探讨土司问题,离不开区域总体史方法,这对完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以及关键概念等土司学的核心理论有益。之所以择用区域总体史方法,是因为土司区散布于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地带,自然与人文环境乃至国情千差万别。它需要以土司为原点,借助多层次的史料,在历史与文化的整体事实之中关注群体和事件,透过历史时段、区域层位以及文化形态的逻辑层次进行总体观察<sup>[40]1-26</sup>,最后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避免邹建达所指出的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sup>[41]</sup>。

其八,“土司学”理论体现构建的步骤与使命。它主要是要能在任务、操作步骤、责任与使命等方面达到“要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系统总结前人的研究积累,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完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撰成《土司学概论》。具体操作步骤,是先将“土司研究”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的专门史,然后完成土司学的学科构建,入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之林。它要求土司学者和组织者务必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首先是土司学者,要发扬求真求善的优良学风,在“大一统”中国乃至全球视野之下找到土司与中华帝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之间的以及“区域自治”实际需要与土司兴亡之间的契合点,认清研究客体“土司”与其他学科的从属关系,结合自身的学术积淀

形成研究侧重点,进而使自己独立研究能力、讲授能力、编辑能力和课题组织管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其次是土司研究组织者,要胸怀学科发展全局,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及时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尽可能提高学术成果的决策参考率,赢得社会效益。

总之,“土司学”提出八年来,在各界不断推进中固然逐步成长起来了,但是它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前沿问题、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仍然很多,继续推进的空间依然很大。这主要集中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它需要土司学界在“土司学”自身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规划统筹、土司学基本概念系统建设、通论性著作编纂、借鉴国内外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论成果拓展土司学研究范围、学理层面研究、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解决等方面下功夫,以此才能形成“土司学”推进的速度与力度统一,最终取得实效。

#### 四、基本结论

“土司学”在明清时期作为学校教育实体,是以土司“官学”的面目出现的,之后从民国时期开始一直被民族教育史学者沿用。自从它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立即引起政界和学界的重视,迅速形成共识。八年来,土司学界通过各项工作使“土司学”已变成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土司研究因此由“绝学”而渐成“显学”,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扶植对象,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在速度与力度之间,“土司学”的推进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推进“土司学”的着力点还未找准,尤其是“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存在着很大不足。只有进一步找到推进“土司学”的着力点,重视土司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的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才能切实解决好“土司学”的推进力度问题,取得“土司学”学科建设的突破。

致谢:感谢章贇、覃芸、陈东等同学查找与核对相关文献资料。

#### 引用文献:

- [1] 廖佳玲,谭清宣.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2).

- [2] 周予同.中国学校教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 [3] 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特点与深远影响[J].重庆社会科学,2007(1).
- [4] 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 [5] 成臻铭.土司城的建筑典范——永顺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 [6] 凤生云起土司文化——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侧记[N].来宾日报,2009-04-24.
- [7] 李世愉.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 [8] 毛佩琦.关于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 [9] 张连君,何源.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J].民族学刊,2014(1).
- [10] 岳小国.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 [11] 李大龙.多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土司制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 [12] 邹育.分析土司结构与改革和土司学研究的意义[J].大众文艺,2013(17).
- [13] 彭武麟.土司制度研究: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兼论近代中国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J].青海民族研究,2014(2).
- [14] 李良品,李思睿.构建“土司学”的几点思考[J].青海民族研究,2014(2).
- [15] 李大龙.关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几点思考——以“羁縻”为中心[J].史学集刊,2014(4).
- [16] 万红.乡土教育视阈下的土司文化及其价值[J].民族教育研究,2014(6).
- [17] 李媛媛,刘苗苗.大历史视野中的土司文化[J].文化月刊,2014(Z1).
- [18] 段红云.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土司的区域政治与国家认同[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 [19] 陈文元,杨洪林.容美土司研究综述[J].三峡论坛,2015(6).
- [20] 彭武麟.土司制度与传统中国多民族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现代性问题——兼谈土司学研究之路径与理论取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 [21] 彭福荣.乌江流域土司文化述略[J].长江师范学院学

- 报,2016(1).
- [22] 陈亚南. 清末边疆地区壮族土司社会的个案研究——以广西《万承诉状》为中心的考察[J]. 昆明学院学报, 2016(1).
- [23] 岳小国. 申遗视阈下的“土司学”研究[J]. 三峡论坛, 2016(4).
- [24] 贺晓燕. 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召开: 土司称“学”任重道远[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9-21.
- [25] 党会先. 播州土司研究现状及展望[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4(3).
- [26] 李延宁. 中国土司学高层论坛(2016)述要[EB/OL]. [http://www.cssn.cn/zgs/zgs\\_jl/201610/t20161029\\_3256244.shtml](http://www.cssn.cn/zgs/zgs_jl/201610/t20161029_3256244.shtml).
- [27] 李良品.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J]. 民族学刊, 2015(3).
- [28] 苍铭. 从申遗看土司制度研究存在的不足[M]//湖北省文物局, 三峡大学, 等. 唐崖土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 [29] 马大正. 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 [30] 李良品. 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4).
- [31] 叶小琴. 近六十年来嘉绒十八土司研究综述[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 [32] 周妮. 解析渝东南地区的土司地名文化[J]. 中国地名, 2013(10).
- [33] 余仙桥. 近十年我国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综述[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 [34] 赵丛苍, 张朝, 赵戈. 土司文化与军事考古学[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 [35] 马国君. 明代土司出任流官的途径、原由及特点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36] 李莹. “土司体育文化”研究综述[J]. 搏击·武术科学, 2014(3).
- [37] 蒲瑶. 外国学者言说中国土司制度——评《帝国深入西南: 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J]. 黑龙江史志, 2015(1).
- [38] 周扬, 雷学华. 鄂西唐崖土司研究的史学思考[J]. 学术评论(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
- [39] 李良品. 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 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 [40] 赖建诚. 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41] 邹建达. 土司研究应避免碎片化[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5(3).

(责任编辑: 陈伟)

## On the Proposal and Advancement of the Study of Tusi

CHENG Zhenm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advancement of the study of Tusi should be examined and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The study of Tusi, as a name of school education entity during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316—1912) dynasties, now has caus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since it is illustrated as a specialized study.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nd the succes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cept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fluential. However, the study of Tusi is still limited.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wo aspects, one is to widen materials and content, the other is to strengthen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 words:** the study of Tusi; Tusi system